

对施宜生悲剧命运的追问

Making a Detailed Enquiry about the Tragic Fate of Shi Yisheng 撰文/李春喜

福建省京剧院《北风紧》一剧塑造的主要人物施宜生,很难说是“宣扬”了“牺牲小我为国家奔走的爱国主义情怀”,并以此获得了“重大的现实意义”——这种简单的戴高帽式的概念化评价,其实并没有准确地揭示出这个艺术形象所具有的深刻、复杂且极具现代性的意义和价值。

中华民族的既往文明史是一个多民族不断矛盾、更不断融合的漫长历史过程。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中华民族历史上许多仁人志士的爱国情怀,常常表现为在民族矛盾中对一个民族(国家)的热爱和忠诚,对自己民族利益和人民疾苦的关切,对社会正义和人生理想的追求,并为此不惜牺牲生命。随着历史的发展,各民族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的爱国精神和实践汇聚起来,就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爱国主义传统。

在《北风紧》里,施宜生生长于宋,而得志于金,他是“北国南朝,一心两率”,“一边是我的故国父老,一边是恩义齐天的大金”,其政治视野和行为准则已经超越了一个民族的利益范围;作为金国尚书,他反战主和,考虑的是宋金两国百姓的“休养生息、民生安乐”;身为议和正使,驿馆中以“北风紧”三字把金兵南侵的机密泄露给宋,他忧虑的是故国南宋的“父老乡亲惨遭涂炭”;面对金国偷袭惨败,面对南征将士的尸体、孤儿寡母的眼泪,他又深感愧对恩深义重的大金,“愿以死谢罪”。这样,施宜生所追求的古代文人兼济天下、民为贵、仁爱爱民的人生信念、社会理想和为此付出的努力,就必然与宋金两个权力集团不顾百姓生死,或武力侵占中原、或偏安江南一隅的狭隘的政治利益诉求发生尖锐的冲突。这一冲突决定了施宜生的悲剧命运,并构成了他的悲剧的历史和时代的成因。当施宜生为保护百姓而破坏了金兵南侵时,他的泣血示忠也罢,勇敢担当也罢,当然都不可能挽回被处死的命运了。

京剧《北风紧》既没有把施宜生写成叛徒,也没有概念化地简单地把他翻成一个爱国志士;艺术家们超越了一般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意义层面,深入挖掘了这个历史人物身上所具有的贯通古今的精神文化内涵,通过施宜生的命运,写出了一个古代文人以天下民生为本的社会理想和人生信念在那个时代不可能实现的历史悲剧,使这个艺术形象走进了今天观众的心里,深深地感动了我们,并引起了我们对历史和当下生活的思考。这才是这个戏的“重大的现实意义”。

从一个人的性格讲,施宜生有抱负,更有实现抱负的强烈欲望。在南朝视他为敝屣之后,施宜生去国离乡,北上金

国,开始了飞黄腾达的人生,但也由此迈出了他的身份、情感、生命被南朝和北国所“车裂”的悲剧命运的第一步。他在金国娶妻生子、官居尚书,但他却反对金帝南下中原、开拓疆土;他身在北国享受荣华富贵,但他的精神却浸润在深邃、悠远的中原文化中;他以大金高官、议和正使的身份受到同学旧友的恭维,心中的落寞却惟有自尝。特别是当他的南人身份被用来掩盖金兵南下的军事阴谋时,他是真正陷入了空前的精神和情感的危机中了。一边是生他养他的故国,养育之情难忘;一边是给他生命、给他天伦、给他仕途的新朝,知遇之恩当报。在对立的故国南朝之间,施宜生不能只选择一个,施宜生也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忠信仁义,知恩图报,一个由中原文化和儒家伦理养成的文人性格必然陷入了两难的困境。金兵已挥师南下,南宋危在旦夕,施宜生没有选择两全的可能,他却非要作两全的努力,施宜生的性格悲剧是不可避免的。

面对丈夫施宜生“告密”、父亲大将军“战死”的悲惨结局,完颜标艳曾要赶走丈夫回南朝,以避免孤儿寡妇的家庭悲剧。但施宜生却是“大丈夫有罪我来受有祸我来当”,决心以死谢罪,表现了古代士人舍生取义、勇于担当的精神品德。施宜生以其在南朝北国间难以割舍的痛苦煎熬,以自己的生命和家庭的悲剧,完成了一次古代文人忠信仁义、知恩图报、舍生取义、勇于担当的精神世界和道德规范的构建。在施宜生这个执著的自我道德完成的背后,却是大金千万将士的尸骨和妻儿无尽的眼泪。在这巨大的代价面前,死,难道可以让施宜生得到解脱吗?死,难道可以让那个漂泊在南朝北国间孤独的灵魂获得片刻的安宁吗?

无疑,历史和现实都需要施宜生这种精神和道德的建构。但施宜生形象的美学价值绝不在于仅仅证明这个道理。一个在异质文化间漂泊的软弱文人,一个在命运抉择中煎熬的痛苦灵魂,一个在高尚的道德实现中又制造着新的苦难的无奈人生,所有这一切都给了当代观众以巨大的心灵震撼和丰富复杂的审美感受。

综观今天的京剧舞台,《北风紧》在继承并发扬京剧艺术魅力的同时,成功地展示了施宜生性格的丰富性及其悲剧命运的现代意蕴,这对京剧艺术现代发展的意义是十分值得重视的。

(李春喜: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原副主任)

责任编辑/魏 明